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六期 ——
(二〇〇五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4a)

【文献资料】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林立衡
【千秋功罪】历史岂能尘封	史学
【往事如烟】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	佚名
【当事者说】围攻解放日报社事件和市委“后院起火”	陈丕显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献资料】

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 林立衡 •

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注：刘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李文普(注：李是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注：指林彪)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

晚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晚9点，叶群叫

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与此同时，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主任（注：指叶群）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

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8341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8341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1972年8月26日周总理见到我时说：你当时也只能那样做。

在去8341部队大队部之前，我让刘吉纯把李文普找到96号楼院子里一个僻静处，对李、刘简单说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我还特地问李文普：“首长是否知道林立果对我说的。”

李文普说：“首长哪会知道这些，首长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长身边，这我还不清楚？”

我说：“既然如此，你能调动大队部的人保证首长安全吗？”

李文普说：“没问题，我能保证。”

李文普说：“汪东兴和张耀祠在九大后让我兼任8341部队副团长的职务，首长、主任没有同意。他们又在党委会上做出决定，使我有为首长的安全调动8341部队。”

关于8341部队的这个决定，叶群也曾跟我提起过，我对李文普说：“我对你谈了几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一定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吗？”

李文普说：“能保证，你放心好了”。

我又问：“你有把握吗？”

李文普说：“这不成问题，我们有这么多人，林立果要是真的要跑，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

李文普还说：“主任叫我明早6点去广州，要我先不要通知8341部队（按惯例，林彪去哪儿都要事先报告总理、事先通知8341部队负责人）。我去问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坚持要去大连。主任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有。主任又去劝首长，说广州的住处有冷气不热，首长便把我找去，对我说去广州也行。首长只知道换个环境去广州养病。”

我说：“你和8341部队常打交道，有工作关系，我常年不在家，不认识他们，找他们不合适，还是你亲自去大队部调人吧。”

李文普说：“主任说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要是真的是去广州而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问题，那可不得了！”

我说：“首长身体长期不好，你身体也不好，你辛辛苦苦一直跟着首长，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是在保卫首长安全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负到责任，那你在首长身边二十年不是白守了吗？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帮着主任骗首长虽然是不得已，但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难道现在这个时候你还继续帮着骗首长？要骗到底吗？”

我说：“你再不去就晚了，主任把你女儿送到空军去当兵，你可不要因此被主任拉过去啊。你也许怕主任，但怕也没用，如果首长的安全出了事，你逃脱不了责任，因为你是这里工作人员的负责人，到时候，你怎么向中央交待？你要是跟着走，那你就是叛徒。你要是没保护好首长安全，就是你没走，你也要为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李文普说：“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搞不清情况，这些情况都是你从林立果那儿听来的，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可以在飞机上采取措施，反正我们人多，我对工作人员已经布置好了。”

我明白李文普是想让我找8341部队，虽然我去大队部没有李文普合适，但如果不去李

文普就更不相信我讲的情况了，于是我断然说道：“你不去，我去！”

李文普马上表示赞同，说：“那好，你去吧，我在上面守着，你见到张宏就说是我同意你去找他的，是我派刘吉纯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

李文普接着向一直在场听我们谈话的刘吉纯交待任务，让他出面对张宏说明情况。

我问李文普：“现在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是谁？”

李文普回答：“是张宏，他是老红军，是军级干部，职务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负责整个北戴河地区的中央首长安全。”

我问：“这个人怎么样，我找他行不行？”

李文普说：“张宏是这个地区的头，现在调动部队不需要经过他，你可以找姜副大队长，这个人比较精干。”

我问：“姜副大队长通常呆在哪里？”

李文普答：“在二大队大队部。”

接着，李文普又对刘吉纯交待说：“你先去找姜副大队长，接着找张宏说一下情况，然后再让立衡和张宏他们谈。”

我说：“我找张宏谈了之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系，因为你有权代表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

李文普说：“那好，就这样吧。”

我说：“我叫张宏带部队上来，由他们出面阻拦。在部队没有上来之前，你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不然就麻烦了。”

李文普说：“那当然啦，我会尽量拖延时间。司机老杨听我的，这不成问题。”

我说：“你知道林立果和刘沛丰是很会开车的。”

李文普说：“这我知道。就按你说的办，在张宏没带部队上来之前，我一定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

我问李文普随身带枪没有。

李文普说：“没有。”

我责备他说：“你们平时都带枪，到这时候为什么不带枪？”

李文普说：“枪放在宿舍里，马上就带。”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

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首先明确对张宏说是李文普让我来找他的，然后向张宏讲了林立果对我说的话，还讲了林彪的两个卫生员今晚告诉我的情况。

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还告诉他：“9月7日首长对我说是要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让李文普和刘吉纯骗首长，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9月8日林立果去北京是瞒着首长的。今天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后，机场曾打电话向‘林办’询问，首长和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林立果已经回来了，叶群可能也不知道林立果什么时候回来，以至没有事先派车去接他，林立果是开机场的车回来的，现在那架飞机还停在山海关机场。”

当我跟张宏说李文普、刘吉纯等工作人员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林彪时，张宏说：“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姜副大队长在一旁也讲了一些他所知道的有关林彪被叶群欺骗的事。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6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反正一定会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一点你尽管放心，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他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兴报告。

我问：“向他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反复问张宏：“你们能保证首长安全吗？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吗？”

张宏说：“我们能保证！我们驻在这里就是这个任务嘛，你放心，到时我们都到96号楼停车的地方去，在那里守着就是了，这还不保险吗？”

我问：“你们有多少兵力？”

张宏说：“这一片都是我们的部队，有二中队、四中队、六中队，还有机动部队，我还可以迅速从附近调部队来。”

我问：“你们有多少辆汽车？”

张宏说：“我们这里有机动小车队和大车队，随时可以出动。”

我说：“这么大的事，你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光嘴上说说呀！一定要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

张宏说：“我马上报告，同时调部队采取措施。”

我说：“林立果讲他在东山有个秘密机场，可以监听全国的电话，包括这里通往北京的电话。这里和北京只有一条专线，你和北京一通话，他会不会马上知道？”

张宏说：“嗨，什么秘密机场，我们都知道那个修建了一下的土机场，那儿也属于我们的警卫范围，我们经常看见林立果去那个机场。我们部队这条电话专线是可靠的，这点请你放心。”

我问张宏：“要是事情提前发生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到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

我强调说：“你们去问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措施。”

张宏说：“这当然啦，这我们比你懂，你放心吧。”

我进一步问：“如果林立果硬要走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为了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到时候我们对他就不能那么客气了，就是拼了也要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

我说：“你们要注意，林立果、刘沛丰身上有手枪。”

张宏说：“我们也有枪啊，到时候我们多带些人不就行了。”

我强调说：“尽量不要开枪。”

张宏说：“我们不会开枪，也没有必要开枪，开枪保证不了林副主席的安全，打伤了谁也不是小事。到时候，我们几个人对付一个……”张宏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擒拿的反绑姿势，然后继续说：“就这样，两个人从后面上去把胳膊一架就行了！”

我说：“你们要多准备几个措施！”

张宏说：“96号楼周围都由我们的部队守着，每个路口都是我们的哨位，每个岗哨都有电话，我们还有电台和步谈机指挥，有什么情况我们马上就能掌握。你不是见到几步一岗嘛，我再派些部队去加强哨位，再派些精干的人坐先行车去机场，这样的话，前面、后面都是我们的

部队，你尽管放心好了！”

我说：“李处长叫你马上跟他联系。”

张宏说：“那我直接和他联系。”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说得这样有把握，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

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 8 3 4 1 部队的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

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 6 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离开叶群后，我又到看电影的座位上和张清林商量了一下，叫他在此处应付林立果。然后与李文普和刘吉纯一起来到院子里商谈，我问李、刘二人带枪了没有，他们说带了。

我说：“给我看看！”

李、刘二人让我看了他们腰上带的手枪。

我问：“首长现在怎么样？”

李文普说：“首长啥也不知道，同平常一样，11 点就上床睡觉了。”

我问：“工作人员布置的怎么样？”

李文普说：“正在和他们谈，他们知道了，我们有这么多人，没问题！”

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又来找我李文普，说：“主任找你，叫你马上去。”

李文普立即去见叶群，回来后对我说：“主任叫我立即安排去广州！”

与此同时，空军保卫部警卫处长杨森来找我，说张清林让他通知我，叶群正在找我，让我马上准备出发。

我一听急了，对李文普说：“你一定要守在首长身边，要绝对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我先去一下放电影的地方，然后马上去找张宏。”

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着头，当着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

我从院子走到通往叶群房间的走廊门口，看到身材高大的姜副大队长和杨森正守在门外，叶群的车刚调过来。

我让杨森控制住叶群的车，嘱咐姜副大队长等人守住叶群和林彪住处的门口及车库。

姜副大队长说，他正在两个门口之间来回走动，两边都在注意守卫。

我对他说：“叶群马上就要走了，我要去下面找张宏，上面的事托付给你了！”

姜副大队长说：“知道了，你放心去吧，叫副团长赶快上来”。

我刚走进叶群住处的走廊，叶群就出现在电影银幕前宣布停放电影，叫我和张清林、张宁马上拿行李去机场，让工作人员也一起走。

情况突变，我连与张清林说话的时间也没有，便和张清林、张宁趁着拿行李的机会走出 9

6 号楼。在门口见到姜副大队长时因有其他人不便说话，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用目光示意他要守好林彪的大门，他点头会意，并调了一辆车让我快上。

我叫张清林留在我们住的 5 6 号楼应付林立果，让杨森和我一起去大队部。车子很快开到大队部，但大队部值班室空无一人。杨森立即去找张宏，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张宏找来。

我告诉张宏：“李处长和姜副大队长叫你赶快到 9 6 号楼去。”并请他立即命令部队封锁通往山海关机场的道路。

奇怪的是，当我反覆讲这些话时，张宏虽然满口答应，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后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

等他回来时，我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

张宏看着我，一声不吭。

我说：“你不上去，那就在这里给李文普打电话联系！李文普让你快同他联系。”

他还是不吭气。不论我怎样急切地恳求他，无论我说什么，他仍然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低头思索着什么，态度完全变了，他始终没有用身边的电话和李文普联系，始终没有上去！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 5 6 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到楼前，向道路两旁的部队喊：“快堵住，快到公路上来堵住！”然后直奔大队部跑来。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张宏说：“我早已派先行车去机场了，有的部队还没调来，是不是汽车出故障了？”

这时已是 1 1 点 3 0 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动调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作声，一转眼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只见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对张说：“我这样找你们，苦苦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你们就是不听，李文普也调动不了你们的部队，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杨森也对张宏说：“飞机上了天，黑乎乎的，你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拦住，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萧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我们可冲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团长！”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

我对张宏说：“你们是专门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如果首长被弄走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张宏一声不吭，我反覆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他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他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他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指着值班室的电话机，要求他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他几次，他都不挂。

我抓起电话筒说：“你不挂，那我就挂了！”

他一听马上接过话筒向北京挂电话，说了声：“挂通了。”就把电话筒递给了我，可是我呼喊了几声也无回音，只听见军委总机的话务员说：“是叶主任吗？”

我佯声嗯了一下，话务员说：“总理正在开会，马上就来。”

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在1972年8月26日见到我时告诉我，叶群打电话说他们要请假去广州——接着，我在话筒里听到话务员不断地呼叫：“叶主任，叶主任……”我没再吭气。

话务员问：“怎么回事？没声音了？”

我放下话筒，告诉张宏电话没接通，请他再向北京挂电话。

他很快就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并且还告诉张耀祠我们不肯跟着上飞机。

我急了，一把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简单地向张耀祠报告了一下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欺骗的，不是要逃跑，现在情况万分危急，请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张耀祠在电话里只是：“嗯，嗯，嗯……”。

我不断急促地向他呼喊：“张团长！求求你，现在就下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他还是在电话那头儿，“噢、嗯、嗯”着，说他要“再请示”。

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呀？！”

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一辆红旗车已穿过56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从大队部门前开过去！”

在张宏仍然没有下命令的情况下，萧中队长和值班室里的其他干部带领战士冲了出去，张清林也要了一把手枪冲了出去，只剩下张宏和一位参谋呆在室内。

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

8 3 4 1 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

这期间我一直拿着话筒，没有中断与张耀祠的通话。我向他报告了红旗车从 9 6 号楼开下来，经过 8 3 4 1 部队大队部门口接着有人开枪的情况，哭着请求他“立即命令部队从反方向阻拦！”“立即封锁山海关机场！”“现在就采取措施！时间还来得及！”

我还对他说了山海关机场附近有海军、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情况。

听到这里，张耀祠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我马上再去请示。”张耀祠让我把电话交给张宏。

张宏接过话筒和张耀祠说了几句话，然后扎上腰带便跑出去了。

我仍拿着话筒不断呼叫张耀祠，等着他请示上级的结果，同时用另一个电话打到 9 6 号楼。

接电话的是叶群的内勤孙忠堂，他告诉我：林办的工作人员全部冲出去了，楼里没有几个人了。

我让小孙告诉留在楼里的人，马上带枪维护现场，保护好房间里的物品。

令我气愤的是，在 8 3 4 1 部队大队部值班室里，任我对着话筒呼天喊地，张耀祠始终没有电话里再次回答他请示的结果。

事后我问姜副大队长：“我和你说得好好的，你怎么没带部队拦住呀？”

姜副大队长流着泪伤心地说：“副团长叫我上先行车了，我对不起林副主席……”

姜副大队长等人气愤地告诉我，他们在先行车上一直等张副团长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反而给红旗车让了路，直到张宏的小车开来才一起在后面追赶红旗车，但那时已追不上了。

按照过去的惯例，8 3 4 1 部队要在林彪上飞机之前派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保卫工作，登机检查安全措施，然后站在飞机四周和舷梯两旁护卫林彪上飞机，并要派警卫人员随机护卫；同时，还要有大批警卫干部、战士搭乘另一架飞机护送同行；如果目的地没有 8 3 4 1 部队驻守，还要派部队乘飞机或火车到预定地点打前站，布置严密的警卫措施。

多年来，林彪从未脱离过这种“严密”的护卫和跟随，但在这次事件中，8 3 4 1 部队却一反常态，不但不严格履行警卫规则，还拒绝执行周总理于当晚 1 0 点多迅速下达的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

按当时的紧急情况，8 3 4 1 部队应该在确保林彪安全的前提下迅速进入情况现场，分析情况后果断进行处置，包括立即逮捕林立果和刘沛丰等相关人员，这部是很普通的警卫常识。

然而在三个小时内，他们面对我的报告和请求，除了让我跟着上飞机外，并没有采取张副团长一开始向我保证的：“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上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的具体措施。

唯一的举动就是最后的”快追”。

而这个”快追”又起什么作用呢？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

晚12时左右，那架三叉戟飞机亮着指示灯隆隆地从我头顶掠过，徐徐盘旋，向南、向西，最后向北飞去。

~~~~~

## 【千秋功罪】

历史岂能尘封

· 史 学 ·

### ◇ 一个举世关注的历史课题

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半官方的香港媒体，一年之内，两次公开播放有关质疑林彪事件的电视节目。期间，还发生了上海解放日报（原华东局党报），连续转载舒云女士关于林彪疑案的长篇文章和吴法宪女儿等人，在海外出版“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的重要事件。这些不寻常的事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事实为根据，直接挑战官方关于林彪事件的结论，直接挑战那个臭名昭著的，被图们、肖思科、高德明等“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奉为“正义的审判”的公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方对于这些接二连三的“质疑”和“挑战”，并没有作出任何“过激”的反应。是容忍？是默许？是还历史本来面的开明？还是另有苦衷的无可奈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这些接二连三的质疑，充分说明林彪事件，已经成为一个举世注目的重要历史课题！不仅国内历史界关注，西方历史界关注，香港新闻界关注，更重要的是，手握着林案第一手证据的前苏联的许多研究部门，普遍认为林案疑点很多。因此，都严密地“盯”着林彪事件档案的最后解密！这样，林彪事件真相，重见天日，指日可待！

图们等专案人员，心里很清楚，他们并没有掌握破解林案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搞了不少逼、供、信，编了不少谎言、伪证，欺骗世人。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当年的讲话，对他们的冲击，就是很大的；之后，前苏联的解体和那场著名的“动乱”，更使他们日夜忐忑不安！但是出于“党性观念”，“组织纪律观念”的历史局限性，他们还不得不背弃“良心”和历史事实，去维护官方的“结论”。最后，他们就是寄希望于“能混则混，最好当事人，全都死光”，寄希望于林案成为历史悬案。以此，逃避自己历史的罪责！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吗？！只有德国法西斯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才希望世人永远忘却他们的历史罪恶！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林案，想混是混不过去了！拿出勇气，面对历史，揭露林案真相，才是你们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 ◇ 查清李文普那一枪

李文普本是林彪身边的一位保卫参谋，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他在林彪逃亡机场的车子里，听到林彪问及“伊尔库斯科有多远？”，从而确认林彪要叛国投敌。之后，他命令林彪的坐车，停下来。他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

李文普的证词，就成为林彪企图投靠苏联，卖国求荣的重要证据。

我们且不去说李文普提供的证据，仅是一个孤证的问题。也不提作为林副主席的随从人员，车行半路，命令林彪的驾车停下来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在此只研究一下，李文普下车时，被林立果开枪击伤的问题！研究一下李文普有没有说谎的问题！

凤凰卫视在采访参与坠机现场勘察的苏方人员时（见史学：“凤凰卫视就林彪事件采访扎格沃滋丁的报道”，载本刊 z k 0 4 1 2 c），苏方当事人说：到场的苏方的法学专家，在勘察现场时，提出机上无“枪战”的结论。证据就是：苏方察看了林彪座机人员的全部武器，机上枪支毫无击发痕迹！对于这一点，苏方人员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世人无法相信，苏方专家，连枪支是否击发，这样简单的技术问题，都鉴定不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苏方现场勘察人员认定：所有枪支均无击发。也就是说，包括林立果用来向李文普射击的那支枪，也是没有击发痕迹的。那么显然，李文普身上那一枪，就不是林立果打的，而是李文普自伤！林豆豆和张清林是在现场给李作临时包扎的当事人。当时就作证，此一枪是李文普自伤。但李矢口否认！后来给李文普包扎的人，不止豆豆和张。还有其他医务人员。他们都是重要当事人。走访一下这些当事人，就可搞清楚李文普是自伤，还是他伤！另外，李文普自己的那支枪，事后专案组肯定已经收缴。专案组对枪支的使用情况，必然了解！实际上，李文普挨的那一枪，是他自伤，已无疑问！因此，李文普在枪击问题上，作了假证，说了谎，就确凿无疑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李文普为什么要在自伤和他伤的问题上说谎？！他又是怎么说的谎？期间，他与专案人员之间，有没有互相默契，又达成怎样的妥协条件？！这样看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与李文普挨的这一枪同时提出的林彪问的那句“伊尔库斯科有多远？”的话，也是李文普在专案组的逼迫下，一块儿造假的产物！

有一点刑案经验的人都知道，实际上，在刑案中说谎和作假证，也很难。造假后，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一旦细察，总会漏洞百出！

总之，查清那一枪是否李文普自伤，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林案的突破口。因为李文普是提供林彪叛国投敌证据的唯一证人（是孤证）。既然，他在枪击问题上做了假，说了谎，那么，人们对他提供的关于林彪要去苏联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信性，就不能不提出质疑了！

纵观林案的重要证据，实际上只是三位小人物在支撑。其一，是李伟信（原上海空四军的宣传干事），他是“5 7 1 工程纪要”的半个见证人。其二，是李文普，他是林彪企图叛逃苏联的唯一证人。其三，是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他是“5 7 1 工程纪要”的“缴获”者。这么大的一个林案，靠这么三个小人物来支撑，实属滑天下之大稽！

#### ◇ 由林彪专机的飞行路线想起的

关于林彪专机的飞行路线，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敏感问题。焦点就在飞机是否从苏、蒙边界向南折回？

前苏联情报九局局长，（他是直接接受安德罗波夫的指令，全权负责林案现场调查的第一当事人。他先后多次勘察坠机现场，堪称世界级权威人士）曾给出了专机的飞行路线：飞机飞抵蒙苏边境，在距苏联赤塔 5 0 公里处，来了个几乎是 1 8 0 度的大转弯，向南折回。苏方认为，它的油料不仅足够飞到赤塔，而且飞抵伊尔库斯科和乌兰巴托都没有问题。苏方雷达从飞机一

起飞，就捕捉到目标，而且全程跟踪。关于林彪座机的飞行路线，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更没有提到过“180度向南折回”的重要情节！

这个敏感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事关林彪疑案，是否具有“卖国投敌”的性质！

对于这个问题，我方雷达也一定有能力做到全程跟踪。周总理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决不会忽视这个重要情节。但是为何官方将这个情节掩盖了呢？！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掩盖”，“欲盖弥彰”？这一切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直接事关动摇，甚至颠覆官方关于林案的全盘“结论”！

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存在如此重大疑点的案子，负责案件侦察的公安部门，怎么敢贸然提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又怎么不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查清重大疑点？！只有一个可能：政治需要，长官意志！

我们查一下地图，就会明白：飞机从苏、蒙边界向南折回的距离，相当于起飞距离的四分之一！于是人们要问：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在黑匣子没有解密的情况下，人们可不可以这样猜测：开始时，林立果有可能在驾驶舱内，指挥飞行。林总中途发现了问题，将林立果严词撤下，到后机舱，命令叶群前抵指挥位置。于是才有坠机后，尸体分成前、中、后三堆的特殊分布？

这个飞行路线，更加强了人们对飞机，有被击落的可能性的怀疑。作为有常识的空军指挥人员，当不明飞机飞临领空时，往往不会立即将其击落，而是严密跟踪。当它突然180度返回，发生异常机动时，首先想到的是：此机已完成“侦察”任务，企图溜回。不能让它带回情报，应将其击落！而且在温都尔汗地区，蒙方火力条件许可，蒙方也向苏方通报了，开火是合乎逻辑的！唯一不支持此猜测的是那个机翼上没打穿的“洞”！孙一先对此也是匪夷所思：洞的直径是够大了，而且是在机翼根部最厚处，非一般爆炸可致。那为何未洞穿机翼呢？碰到这种问题，按一般办案原则，还须继续搜集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但事实是，官方竟置办案常识于不顾，急于结案。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和迫不及待的心情，可见一斑！这样办案，能不办出冤案吗？！王海是个英雄飞行员。但在此事上，轻率地作出“油料不够，导致迫降”的结论，使人们对他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屈从政治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飞机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如果真发生了“变故”，机上对话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孙一先说，机上话语机一直开着。（是推断，还是事实？）这更说明“黑匣子”的极端重要性！为何33年了，中苏已由敌手，变为“战略伙伴关系”。对于本属于我国的“黑匣子”，我方为何不要回？对于我方人员的遗骨和物品，我方为何不要回？是否我方根本不想让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试问，如果真是一架民航机，在苏联失事，我国会不会33年后，仍将机上人员的遗骨，弃置不问？！日本士兵在菲律宾和朝鲜的遗骨，人家还要找回去；美国还要找回在朝鲜和越南的士兵遗骨。相比之下，我们两个政治局委员和7个军队干部的遗骨，33年都不管。何人道之有？！

还有一点，苏方人员咬定飞机出事时，机上人员都已死去。我们想他们作为比较客观的一方，而且都是法医鉴定的高级专业人员，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会没有证据的。那么，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个案子既然是苏共最高级领导，亲自布置的，一定会有正式报告，该局长也会有相关记录和日记，并存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证据！我方33年不要回，或者，要回了而不公布。都是见不得人的，无法面对历史的！难道这就是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吗？！

◇ 林彪的遗骨等为什么至今还不要回来？！

关于256飞机是不是民航机？关于机上人员的遗骨应不应要回来？由谁负责要回来？现由苏方扣留的林彪带走的“中央文件”，应不应要回来，为什么至今还不要回来？！等一系列问题，很值得大家来探讨一下。

关于256飞机的性质，根据我方外交人员跟蒙方人员的外交交涉，认定是“民航机”。孙一先认为，是国家领导人的专机。这已没有疑义！

关于机上人员的遗骨，应不应要回来？由谁负责要回来？我们可以参考国际惯例。二战后，日本国对于在二战期间，遗留在菲律宾、缅甸、中国、朝鲜的侵略士兵的尸骨，都千方百计地通过外交途径，向所在国，光明正大地索回，并安葬了。美国在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甚至对于侵犯我国领空，被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海军击落的间谍飞机上的特务驾驶员的遗骨，也都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越方索回，并安葬。美、日两国从没有因为这些尸骨是“侵略者”、“战败者”（日本二战的是非问题，已由东京国际法庭作出历史性判决），也没有因为“死者家属没有提出要求”，或“时间久远”，就让他们抛尸荒野！我想他们只有一个标准：这些尸骨是日本人，是美国人。他们的政府就有义不容辞的“收尸”义务！

不管历史功过怎么说，林彪毕竟是一位共和国元帅，（至今还没有剥夺他的军衔！）当过党的副主席、国防部长，被党章确认过是党的接班人和毛的亲密战友；叶群好歹也当过党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其他人等，多少也都算个军队干部，其中还有一位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专机驾驶员。不管后来怎么判决，总没有开除他们的“中国国籍”吧！而且，在我方与蒙方的正式外交文件上，也确认他们是中国人。因此，由我方要回这些已故者的骨骸，是完全合乎国际惯例的！只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它的公民，应尽的职责！但是，事实是，33年后，我方无视国际惯例，任其葬身荒野，听凭苏方割其头颅，并以此为荣。这与日本、美国佬的所作所为相比，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又在何处呢？！难道官方要的只是“政治”上的胜利，连国家尊严都不顾了？！

还有一点，就是被苏方拿走的为数不少的“文件和遗物”。当年我方缴获了不少林彪的材料，并称之为“反革命政变的证据”。那么，被林彪带上飞机的文件，一定是比已缴获的文件更重要的机密文件，一定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重要证据！无论从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向全国人民进一步彻底揭露林彪卖国求荣的政治需要来说，都很有必要将它们取回！

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是，33年来，我们竟心安理得地让这些重要机密和重要证据，安放在前苏联克格勃的档案室内，不闻不问！

因此，人们能不能对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提出怀疑呢？！进而对其事关林彪卖国求荣的性质，提出质疑呢？进而对我们已缴获的“文件”的真实性，以及它们作为指证林彪罪行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呢？！

33年后，每一个关注林彪事件的人，都深感：至今官方掌握的“证据”，实在是很少的！那为什么官方至今不去要回来呢？目前，我方作为主权国家，向俄方要回上述属于我方的材料的外交障碍，是没有的。因此，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这些材料中，暗含着足以颠覆官方对林案结论的证据呢？！

◇ “逼死政敌”，是毛泽东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惯用手段

王年一教授关于“林彪是被逼出逃”的历史结论，绝不是凭空而来的！回顾张国焘、王明、

陈昌浩、高岗、刘少奇的被整肃的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出：“逼死政敌”，是毛泽东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惯用手段！

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党内，清算了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分裂党的错误。之后，在西路军问题上，张国焘完全按中央的意见，写信要求西路军“汲取长征路上的错误，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毛主席。但是，西路军失败后，毛泽东为推卸责任，硬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的失败！还要进一步清算四方面军的国焘路线问题！张国焘一方面看着四方面军2万多精锐部下，惨遭马步芳杀害；一方面又要承担“莫须有”的罪名，自己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才脱离了红军！此毛泽东之“一逼”。陈昌浩在西路军战败的过程中，接受了长征路上的教训，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与徐向前、李先念作了“坚决斗争”。但是失败以后，毛强迫他承认西路军的失败，是他执行国焘路线的结果。他承认之后，就被毛“流放到”苏联。陈昌浩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回国，为党继续工作。但毛泽东十几年不准他回来，非要把他赶出中央。文革中又翻老帐，陈昌浩被迫害致死。这是毛之“二逼”。

刘少奇一贯忠于毛路线。刘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也曾是毛泽东迫害张国焘、陈昌浩、彭德怀等同志的重要“帮手”。但是，文革中，被毛以“叛徒、内奸、工贼”等的“莫须有”的罪名，残酷逼死。王明、高岗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毛整人、逼人的历史痕迹。所以，毛对党内“政敌”的整肃方法，就是将对方逼到“死角”，逼到对立面，逼得你跳出来，正好“请君入瓮”。

林彪一贯紧跟毛泽东。出于自保，参与过整红四方面军、王明、刘少奇等一系列“党内重大路线斗争”。深知毛的手段。没想到最后，毛会把刀架到自己头上，卸磨杀驴，兔死狗烹。更不能容忍的是，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当面首肯了林彪准备在第二天大会上，关于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后，第二天就翻脸不认帐，说林彪自己要抢班夺权，“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了毛泽东的“欲擒故纵”的“行伍出身”的林彪，当然要“跳”。尽管林彪多次主动要求和毛沟通，但毛硬是不给面子，还要南巡归来后，再彻底清算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这样，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走为上策！毛逼人太甚，才使得林彪紧急出走。但林彪一走，毛一时又无法向全国、全党交待。为了摆脱被动，于是编造出了“武装政变”、“571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等骇人听闻的故事，以掩人耳目，欺骗视听，就不难理解了！为了这些人为编造的故事，可以自圆其说，毛又迫害了数以千计的高级干部，以造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假象。

历史证明，这些被毛逼死的同志，都是我党的好同志。他们有大功于党，有大功于国。虽然都犯过一些错误，但罪不致死！他们最后的悲惨结局，毛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毛泽东是党内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始作俑者，犯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现在毛泽东死了，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是还毛泽东真实面目的时候了！是清算毛泽东的历史罪行的时候了！

◇ 是“仁至义尽”，还是“一网打尽”？

“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在谈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时，都是一个口径：毛泽东对林彪，是如何“苦口婆心”，“耐心挽救”。尽管对林彪，“丢了石头，掺了沙子”，南巡时，毛泽东又躲过林立果的“尾随追杀”，但是，毛泽东“到北京后，还要找林彪继续谈，他不找我，我去找他”。直到林彪的飞机，飞离国境，有人主张“坚决击落”时，毛泽东仍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似乎真是放了他一条“生路”。一句话，毛泽东对林彪，真可谓是“以德报怨”，“仁至义尽”了。一切都是林彪自绝于人民，咎由自取！

如果说，当时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已，才这么说，人们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将当时的真实情况，披露出来，人们才恍然大悟。事实与“四人帮”的“说教”，完全是南辕北辙，不是一回事！

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1971年9月12日13点10分，如果毛泽东真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游击战”，从林立果层层设防的“地雷阵”中，神出鬼没地，“传奇般”地摆脱了林立果的“亡命追杀”，回到了北京丰台，那么，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此时，内心对林彪的仇恨，一定是怒不可遏！两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奉行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哲学逻辑！那种“到北京后，还要找林彪继续谈”的说法，实在是掩人耳目的“天方夜谭”。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当天午夜10点30分，毛泽东从北戴河，得到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企图胁迫林彪，劫机南逃的准确消息。“怒火中烧”的他，会作出了怎样合乎逻辑的反应呢？

在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披露了当时的真情。

9月12日晚9时许，林立衡得知林立果的出逃打算后，做了三件事。

（1）她先向林彪贴身侍卫长李文普，作交代：带上手枪，寸步不离地护卫好首长，“你一定要守在首长身边，要绝对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对此，李文普当面向林立衡作了保证：“没问题，我能保证。”“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但是，后来的事实是，李文普临阵脱逃了。笔者注）

（2）9点50分，林立衡又去找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军职干部张宏，告知林立果的企图。

张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林立衡反复问张宏：“你们能保证首长安全吗？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吗？”

张说，“我们能保证！”并告诉林立衡，他们预防事变的可靠方案：“这一片都是我们的部队，有二中队、四中队、六中队，还有机动部队，我还可以迅速从附近调部队来。”“我们这里有机动小车队和大车队，随时可以出动。”“我们不会开枪，也没有必要开枪，开枪保证不了林副主席的安全，打伤了谁也不是小事。到时候，我们几个人对付一个……”“就这样，两个人从后面上去把胳膊一架就行了！”“96号楼周围都由我们的部队守着，每个路口都是我们的哨位，每个岗哨都有电话，我们还有电台和步谈机指挥，有什么情况我们马上就能掌握。你不是见到几步一岗嘛，我再派些部队去加强哨位，再派些精干的人坐先行车去机场，这样的话，前面、后面都是我们的部队，你尽管放心好了！”“为了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到时候我们对他就不能那么客气了，就是拼了，也要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

（3）11点20分，在叶群、林立果、林彪，就要上车的紧急关头，林立衡又跑去找张宏，要他“搬兵救驾”。但是，情况与一个半小时前，完全不同了。

“大队部值班室先是空无一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张宏找来。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后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林立衡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

张宏看着林立衡，“一声不吭。”

林立衡说：“你不上去，那就在这里给李文普打电话联系！李文普让你快同他联系。”“他还是不吭气。不论我怎样急切地恳求他，无论我说什么，他仍然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低头思索着什么，态度完全变了，他始终没有用身边的电话和李文普联系，始终没有上去！”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林立衡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到楼前，向道路两旁的部队喊：“快堵住，快到公路上来堵住！”然后直奔大队部跑来。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这时已是11点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默不作声，一转眼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当着我（林立衡，笔者注）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只见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张宏还冲着心急如焚的林立衡和张清林发火，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让你们跟着上飞机，“这是中央指示。”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萧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我们可冲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呀？！”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

好一个“我们是听中央的！”好一个“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这充分说明，张宏得到林立衡报告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并且得到了中央明确的“指示”。这个明确“指示”，有两条：第一，部队按兵不动。第二，林立衡、张清林等，登机同行。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中央指示”来自何方？张宏先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报告，是合乎组织关系的。但是，林彪全家出逃，这样要命的紧急情况，张耀祠决不敢压住。逐级报给汪东兴，周总理也是顺理成章的。正因为这样逐级上报，才有张宏跑进跑出的那一幕。而且，张宏一定是要避开林立衡，才跑到其他地方去打电话。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汪东兴全程随侍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非常了解毛泽东一路讲话的全部内容和愤怒心态，非常了解毛泽东12小时前，刚刚惊心动魄地摆脱林立果“尾随追杀”的全部过程。因此，他得报后，肯定要立刻向毛泽东报告。周总理没有参加南巡。对当时党内职务比他高的林彪，擅自作出放弃保卫的指令，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这个“中央指示”，毫无疑问是出自毛泽东。

毛泽东在当时的心情支配下，拿出了他最惯用的，也是最厉害的“诱敌深入”的杀手锏。

如果当时就对林彪作出“就地擒拿”“接班人”的决定，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实属匹夫之勇。如果让对手做一次最后的“暴露”，来个“欲擒故纵”，才符合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大家”的风范。届时，对周总理这样的老同志，对全国人民，都顺理成章，也好交代。自林立衡向张宏报告情况，到张宏接到指示，有一个来小时时间。虽然紧了点，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时间是足够的。张宏按兵不动，就是“故纵待变”！要林立衡等一干人，统统上飞机，就是不要惊动林彪，让他放胆起飞。以收“一网打尽，彻底取消灭”之功效。

毛泽东在南巡时，还告诫别人：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可见他马上要整人的狠心。所以说，毛对林是“仁致义尽”，那实在是欺人之谈，而要“一网打尽”，才是历史的真实！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的飞机，会向北飞，并折戟沉沙于外蒙。从此，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位“红朝凯撒”的历史地位！

~~~~~

【往事如烟】

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

· 佚名 ·

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徐雅雅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炮打中

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青。卜大华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的“孙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司令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颤抖，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我

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蓦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恐怖。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历史也需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

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篷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

### 【当事者说】

#### 围攻解放日报社事件和市委“后院起火”

• 陈丕显 •

◇ 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966年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

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的《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子，红卫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 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 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 三、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兵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 ◇ 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摄影部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谓“流血

事件”。

报社领导真是如坐针毡，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身心疲惫到极点。但个人累死事小，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哪里出现群众斗群众，哪里就一定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背后操纵。

报社领导一方面要不分昼夜和造反派“谈判”、周旋，一方面要调停门内门外两派群众的矛盾，同时还要为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弄面包。年轻些的同志还顶得住，年纪大点的就顶不住了。韩哲一同志累得晕倒了，前门出不去，只好把报社后面的墙打了个洞把韩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报社的同志紧张，市委的压力更大。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一件小事处置不当，都会造成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导火索，何况这样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当即表态支持曹荻秋、韩哲一他们在一线处理的意见，并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红革会”的做法，要做工作，并让曹荻秋同志立即打电话请示陶铸同志。曹立即给陶铸同志打电话，谈了解放日报社发生的情况，请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铸同志作了四点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对红卫兵冲击，要说服，这是原则问题；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造反派们见陶铸同志有电话来，也拥到报社总机室，要打电话给陶铸同志，要他撤回四点指示，真是乱成一团。

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聂元梓的这番话泄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要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只要看看“决定”、“要求”这些词的用法，听听“责成”这种口气，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气焰嚣张，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动屈辱。签字后，王洪文带着他的人马得意洋洋地撤离报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 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

在这期间，12月12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作好当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做“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月18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党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作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

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分别是河南和黑龙江省“支持革命群众”的领导干部，后当选为省的革委会主任——编者）。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

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多是在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太可笑了”；并指示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这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组织人马进行夺权了。

□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